

论古代假传的文体特点

娄欣星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假传”,即借鉴史书人物传的写作手法为器、物作传的文体形式。历代假传作品数量众多,记载对象范围广泛,作品形式呈现系列化的倾向。作为融合了史传、杂传、小说和寓言为一体的文体形式,假传在写作手法上,不仅“以史为戏”,模仿史传的写作模式,而且融入了小说、寓言中夸张、用典、双关等表现手法,形成了亦庄亦谐的叙事风格。假传通过幽默诙谐的笔墨,寄寓了作者对于自身仕途穷达、道德品行以及社会问题的见解和看法,展现了作者的创作观念和人生社会理想。

关键词:假传;以史为戏;用典;双关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4)01-0015-07

传记,即以记载人物言行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文体样式,根据记载对象或形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而对于传记的类型,其认为大体有四:“一曰史传(有正、变二体),二曰家传,三曰托传,四曰假传。”^[1]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罗列了七种史传体“按传之品有七:一曰史传,二曰私传,三曰家传,四曰自传,五曰托传,六曰寓言,七曰假传。”^[2]所以除了以记载人物为主的史传、家传、托传等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传记形式——假传。所谓“假传”,就是借鉴史书人物传的写作手法为器、物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观念和社会理想。

“假传”滥觞于唐代韩愈的《毛颖传》。《毛颖传》以记载人物传记的写作形式为“毛笔”这一物品立传,全文以史传笔法介绍了毛颖的家族、籍

贯、出身,以及毛颖入宫受用,得幸升迁,最后老而失宠被弃的仕宦经历,篇末还有太史公的议论,文章以嬉笑幽默的笔触抨击了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渲泄其怀才不遇的愤恨。韩愈在游戏笔墨之下寄寓了深沉的政治感慨,使文章不仅具有文学的娱乐功能,而且还有“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3]的审美效果,包含了气盛言直、幽默诙谐的美学风格。

自《毛颖传》之后,假传作品大量涌现,仅明代的假传作品就有 200 多篇;所传物品也是五花八门。一方面,假传记载的范围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物品,记载的对象大多是文人士大夫的书斋必备物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例如苏轼《万石君罗文传》、洪刍《陶泓传》、徐珊《太钝生传》为“砚”立传;李纲《方城侯传》、陈造《蕲处士传》为“棋局”立传;秦观《清和先生传》、唐庚《陆嫕传》、刘跂《玉友传》、任士林《真一先生传》、刘后元《陆生传》、林金《曲蘖生传》为“酒”立传;刘子翬《苍庭筠传》、杨维桢《抱节君传》、洪璐《管若虚传》、宋琬《竹尊者传》为“竹”立传;邢良厚《黄华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简介:娄欣星(1989-),女,浙江仙居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传》、马揖《菊先生传》、杨维桢《黄华先生传》为“菊”立传等。除了文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明代的一些假传还巧立名目,为一些日常生活中人们深恶痛绝的老鼠、跳蚤等立传,如胡文焕《玉衡侯传》为老鼠立传,陶泽《欧阳憎传》为蝇立传,《辛螫传》为蚊立传,《混沌迟传》为虱立传,《毛隐传》为蚤立传等。

另一方面,随着假传数量的增多,假传作品呈现系列化的倾向。自明代开始,假传作品不局限于一传只写一物,而是数物合传,出现系列化的倾向,例如李贽《三友传》为黄莺、燕子、喜鹊作传;陶泽《六物传》为竹夫人、汤婆子、蝇、蚊、虱、蚤作传;支立《十处士传》为布衾、木枕、纸帐、蒲席、瓦垆、竹床、杉几、茶瓯、灯檠、酒壶作传;刘鸿《十二姬传》为笔、墨、纸、砚、水注、裁刀、锥、硃砂、镇纸、笔架、戒尺、笔帖等十二种文房用品作传;陆奎章《香奁四友传》为金亮、木理、房施、白华、梳、脂、粉、周准、齐钗、金贯、索纫、剪、针、线等物品作传;董穀《十五子小传》为梅、杏、花红、石榴、梨、橘、柑、栗、银杏、核桃、柿、枣、桃、李、樱桃等十五种果品作传等。随着系列化假传的问世,也出现了一些独立成书并刊行的假传文集,如《十处士传》、《香奁四友传》、《豆区八友传》等。假传的文体归属向来是存在分歧的。以学术界对《毛颖传》的评价来看,孙昌武先生认为《毛颖传》在文体上,介于寓言和传记之间,中间还利用了小说笔法,^[1] 韩兆琦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则将《毛颖传》等作品称为“寓言体的传记小说”,^[2] 台湾学术界将这类作品称为“拟人传”体寓言,^[3] 韩国汉学界将这类作品称为“假传体小说”。^[4] 所以,可以说,假传是融史传、杂传、小说和寓言为一体的文体形式,假传同时具备了这些文体形式之中的某些特点。

一、以史为戏,戏仿史传、杂传中的人物传记

假传,首先是传记文,这从许多学者对《毛颖传》的评价可以看出“嬉戏之文,其体传也”,^[5] “不直戏文,盖戏史矣”,^[6] 815 “以史为戏,巧夺天工”,^[7] 929 肯定《毛颖传》作为传记体的文体形式和写作手法。

假传作品通过模仿史传、杂传的叙事模式和

笔法,以物写人,将物品当做人来写,作品首先以介绍物品的字号、籍贯、家世、出身等内容作为开篇,使读者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读到的是一篇真实的人物传记,将读者的视野和目光锁定在作者预期的范围内,例如:

《管城侯传》:“毛元锐字文锋,宣城人。(缺)于东墅而生昴宿,一名旄头,遂姓毛氏。”^[1] 8419

《江瑶柱传》:“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海南人。十四代祖媚州,避合浦之乱,徙家闽越。”^[1] 406

《温陶君传》:“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性麦氏,既破,随母罗氏去其夫而适石氏,因冒其姓。”^[1]

《清和先生传》:“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于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后播弃,或居于野,遂为田氏。田为大族,布于天下。”^[1] 169

《竹夫人传》:“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后见灭于匠氏。”^[1] 120

《敬侏儒传》:“敬侏儒者,名子木,字承登,以字行,徂徕人也。祖伯松,长身碧髯,肤甲如龙。”^[1]

以上诸篇假传的开头都将物品当做人来写,通过介绍传主的家世出身下文传主将要展开的人生事迹的描写做铺垫。

接着叙述传主的主要生平经历,大多数假传多从传主历代先祖的杰出事迹开始记载,例如《梅先生传》开篇对于梅伯、梅福事迹的描写,《璞隐者传》开篇对于墨氏先祖显于秦,封为松滋侯,其后瑜囊与管城子颖同升,后扬雄以客卿之,隐于蜀等事迹的描写,通过介绍传主先祖的言行事迹展现这一类物品所特有的功能和特性,通过夸张、荒诞的手法,或称颂其高尚的道德品行,或讽刺其蛊惑人心的卑劣行径,奠定了文章幽默诙谐的风格特点。还有一部分传记仅以记载传主一人的事迹为主,例如《万石君罗文传》主要叙述了罗文隐居自晦,后经毛纯引荐,待诏中书,后拜舍人、丞相御史。时人以文苑四贵称之,后因年老以及官场斗争失宠而卒的生平事迹。《叶嘉传》记载了叶嘉因独特的才能和品行受皇帝喜爱,封为矩合侯,任尚书,后因嘉苦谏,与皇帝疏远,后为皇帝献策

重新获得赏识,其功德亦延及子孙后代,为世人所称颂。有时无需多说其先祖或后世子孙的影响,仅以一人的言行事迹就可以表达出这类物品的特点和价值,同时也寄寓了作者对这一物品的看法和评价。

最后在传尾还附有作者的论赞,或从传主的道德品格方面,或从传主的仕途经历方面,或从传主对于社会的贡献方面,总结传主即某一类物品的本质特征,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这类物品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较为公允地评价了这类物品给社会,给人生带来的影响。李纲在《武刚君传》“太史公曰”中评价了武刚君(宝剑)的性格品行“观其为人明利果断,不凝滞于物,劲正之气毅然见于色,其亦锻炼淬砺之力欤。卒能佐汉以兴,传国数百载,可谓盛矣!”^[14] 赞扬武刚君为人处世明利果断和人格品行的高尚,肯定其在历史上辅佐王朝兴亡更替的价值和作用。《方城侯传》“太史公曰”中说到方城侯(棋局)“二子虽不以诗书礼乐而以兵为家法,‘攻伐不休,废时乱日’,但在作者看来,方城侯之学乃是‘法象所寓,有圣人之遗意……亦有足观者’”,^{[17] 255} 肯定方城侯的可取之处。《文城侯传》评价文城侯(印章):“立志节,以信著天下”,^{[18] 257} “君平之为人,刻志砺己,表表自见,……与人交,虽方圆广狭不常,然始终如一,重信义,不轻为然诺”,^{[18] 256} 以立志节、重信义作为文城侯(印章)主要道德品行特点的描绘,但是却有人“窃借其名以行”,虽“信反而为伪者”,但“诚非其罪故也”,^{[18] 257} 对于现实中人们窃取印章作伪之事给予了批评,对文城侯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假传在写作手法上模仿史传这一文体形式,将物品当做人来写,通过记载人物即物品的家世、生平、籍贯及主要事迹等内容,表现物品的功能和特点,将严肃庄重的史传体和虚诞怪妄的杂传体怪诞之说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对所传物品进行真实细致的描绘,总结其较为全面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在描写传主事迹时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丰富传记的内容,在幽默诙谐的字里行间寄寓作者的创作宗旨。

二、诙谐戏谑的文体特点

在情节的设置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假传

多以想象、夸张、荒诞等形式,将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历史情景、人物逸事趣闻等内容进行重新演绎,或作为传主先祖发源的故事,或作为传主某一重要的生平事迹,制造出诙谐幽默的喜剧场景。作者这样设计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通过人们较为熟悉的情节和故事,展现传主的人生事迹,在表现传主道德品行的同时,隐含这一物品所具有的功能和特性,及其在历史人生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张耒《竹夫人传》为“竹夫人”作传,将武帝与卫皇后等众人避暑甘泉宫一事敷衍成篇。竹夫人因善良高洁得到引荐,常伴皇帝左右,但“归未央,坐温室,夫人自此宠少衰”,^{[14] 121} 竹夫人只有在夏天才能得到皇帝的宠爱,篇尾还引用班婕妤失宠作《纨扇诗》的典故,表面上是写皇帝与妃子的爱情故事,其实不过是借这一故事介绍竹夫人这一器具的功能,即在夏天能够为人们消暑,而在其他时节,只能被弃之一旁的现实处境。杨维桢《竹夫人传》开篇“其先为孤竹君之子曰智,谏武王伐纣,不听,遂不食周粟,饿于首阳山,且死”,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张冠李戴,作为竹夫人先祖的事迹敷衍开篇。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竹夫人以清节家世著称,耻屈身于人,即使是王后嫔妃、公卿执事招之亦不往,“其行踪诡秘,当炎而出,方秋即遁去”,^[19] 以荒诞、神秘的手法展现竹夫人不屈于人,高尚自持的特点。王冕《梅先生传》在情节设置方面,开篇就借用直言谏妲己事、以文学补南昌尉、曹操行军失道将士望梅止渴的典故作为凸显梅先生先人忠言直谏、洁身自好高尚品行的例子,赞扬梅先生自古乃“翩翩浊世之高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20] 231}

在文章的叙述中,假传还巧妙地融入了既能够逼真刻画传主性格品行的特点,又能够暗中隐喻物品功能的语带双关的句子和词汇,营造出亦真亦幻的叙事氛围,具有双重寓意。

陈造的《蕲处士传》从正反两面描述了蕲处士(棋局)的为人品行,一方面,蕲处士以好洁便静、机变警敏的性格特点广交王公庶人,“泛交可多,自王公庶人,有好之无不往,往辄从容竟日。至于闲逸奇谿之人,掘穴嵌严栖迟之仕,尤与之

呢,往往定忘年之交。先以有行,自矜其实,挟数以邀世,机变警敏,无与敌”;另一方面,又因其“任数以肆欺,好胜而喜杀,欲赢而置人于贫,苟生而不恤人之死”^[21]的性格特点,使与之交的王公庶人迷而不知返,通过薪处士(棋局)语意双关事迹的描写,既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也隐喻了棋局具有消遣娱乐功能的同时又好战、迷惑人心的一面,劝解世人应该讲究适度的原则,在娱乐消遣的同时不应沉溺其中。同样是描写“棋局”,李纲在《方城侯传》中描写方城侯(棋局)时,重点描述了方城侯两子连年不断的战争“二子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太素矜太玄之弱,尝听其增甲兵、布行陈、定营垒,然后与之战,而太玄傲然不服,转战逐北,虔刘其边陲,俶扰其腹心,掳掠其士卒,攻围侵断,智诈百出。战罢效首虏,计土地,虽胜负不常,而太素之胜居多。其用兵之法,虽临事制变,不可窥测,然循理而动,致人而不致于人者常胜;不计利害,深入浪战者常败。”通过二子的战争比喻现实生活中斗争的策略战术问题,指出战争形势虽千变万化不可预测,但应该循理而动,不计利害关系,一味只知道打仗的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以方城侯两子的战争隐喻下棋双方用兵之法的较量。在战争下,“夫方城阖四境之内,地方不过数百里,而二子之战,积月累岁,纷拏不解……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者”,^[17] 254-255 隐喻现实生活中统治者之间在利益的驱使下发起无休止的战争,致使战士尸横遍野,百姓生活困苦的历史现实,作者通过语意双关的词汇描写方城侯二子的战争,一方面逼真刻画了二子的性格品行,另一方面也隐喻了棋局这一物品战争不断、讲究用兵策略、伤亡惨重等特点。

同样是描写“酒”这一物品,秦观《清和先生传》主要描写了“酒”的制造过程“有神农之后利其资,率其徒往俘于田而归。其倔强不降者,与强而不释甲者,皆为城旦舂。赖公孙杵臼审其轻重,不尽碎其族,徙之陈仓,与麦氏、谷氏邻居,其轻者犹为白粲,与鬼薪侔。已而逃乎河内,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13] 170 其中“神农”、“麦氏”、“谷氏”暗指酒的原料,“陈仓”、“河内”、“曲沃”等地的迁移,则隐喻了酿酒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通过双关、谐音和隐喻等手法描写了“酒”的

整个制造过程。随后,“及长,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有酝藉。涵泳经籍,百家诸子之言,无不滥解。孟子称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谓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间,而兼有其德,因自号曰‘清和先生’云”,^[13] 170 从气度非凡、蕴藉深厚、清德兼备等方面赞扬清和先生的为人风貌和行事特点,这些特点同时也是“酒”这一物品的功能特性。杨维桢《麴生传》在赞扬麴生(酒:“其人呕呕温雅,凡冠婚丧祭朝燕飧礼无不预,号为通才,尤善导引辟穀之术,故其人最善寿。饮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渐其化,无不醉而陶出其性真”^[22] 137 的同时,也指出了其“麴生之言甘,后世必有以之亡国者”,“溺之者亡国杀身”^[22] 138 的祸患,语意双关,隐喻现实生活中酒能够陶冶真性情的同时也可以给人们带来亡国、杀身的祸患,深刻揭示了“酒”这一物品的本质特征。

这些描述传主性格品德和人物事迹的语言,都极尽体物之妙,语带双关。一方面,既能够生动传神地描绘出传主的性格品行,另一方面又可以暗示出所传之物的功能特征,于此同时也隐喻了现实社会中的某些社会现实,作者希望通过传主人物言行事迹的描写和道德品行的刻画,以道德节操高尚的人物事迹正社会之风,以人物宦海浮沉的人生事迹隐喻人生之道,以人物之间斗争攻伐的事件场景反映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语带双关,寓意深刻。

三、寓意深刻的文体意义

假传自韩愈《毛颖传》开始就呈现出寓意深刻的文体意义和价值。从关注仕途穷达、君臣遇合,到关注个人道德品格,到对世态人情的讽刺,古代假传作品成为文人们反映自身创作观念,抒发理想感慨,揭露社会现实的重要工具。

(一) 君臣道合,功成身退的主题

清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夫知尽之难,则君臣道合,故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君不疑,与君交争而不罪,而得明计国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禄于身,以此君臣相执持,此说之成也。”^[23] 君臣道合,看重的是君臣共治的合作与相互支持的关系。隋唐之际出现的这种君臣之间新的关系,不仅是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的需要,而

且也是天下士人所希望看到的和得到的一种君臣之间互相尊重的关系。^[24]但是,君臣道合作为君臣关系最为理想的范例,强调的是君臣共治天下的过程,但是最后的结果也至关重要。“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返者也”,^[25]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唐以后的假传开始更多讨论这个问题,在君臣道合之下,如何才能功成身退。作者通过传主家世生平为官事迹的描写,寄寓了作者对为官仕途、人生之道的看法。

王禹偁《乌先生传》通过描写乌先生(桑)一生仕途穷达的事迹,赞扬了乌先生深谙人生官场之道“先生始而隐者,求其志也;中而仕者,行其道也;终而退者,远其害也。”^[26]功成身退,实乃天下之道也。晚唐司空图《容成侯传》写容成侯(镜)因其“挟奸邪以事上者,见之胆栗,辄自披露。至于妇人女子媚惑之态,亦不能掩也。”观察细微,不能掩饰的性格特点,致使“疵陋者终恶忌,积毁于上,以为背面不相副”。最后难逃被摈弃的命运。面对容成侯的事迹,作者在太史公曰中说“观炯虽任用,兢兢惟恐失坠,不善晦匿,果为邪丑所嫉,几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27]感叹容成侯因不善于晦匿遭到小人的嫉妒和陷害,道出正直之士在官场斗争之中难于明哲保身的境遇。陆龟蒙《管城侯传》写毛元锐(笔)历代先祖和后辈都因“述美恶不隐,文简而事备”为世所用,加官进爵,毛元锐在晚年“遂恳上疏告老”的事迹得到皇帝的赞赏:“所谓达士,知止足矣……壮则驱驰,老则休息。载书方册,有德可观。”^[28]实际上道出了君臣之间应该遵守的遇合之道,即所谓的功成身退。

自古仕途多艰难,有时并不是因为人物的为官才能和德行不够,只是因为其不知满足,不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而失宠罢黜。功成身退的道理说来容易,但当你真正面对一片大好的仕途前景时,很难放弃对现有一切的拥有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真正的君臣遇合之道和为官仕途之理在于知止知足,一人的仕途经历不可能一帆风顺,但知止知足可以让你功成身退,得到君王赞扬的同时也可以扬名后世。

(二) 个人对于高尚道德品格追求的主题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显达之时为天下百姓造福,不得志时就应该洁身自好,注重个人道德品格的修养。拥有高尚品行的士人,不管其仕途穷达与否,都会谨守其对于高尚道德品格的信仰和追求。作者主要通过对传主为人处世、性格特点等方面的描写,与行文之中展现其道德品行的优劣,及其在这一道德品行支配之下,传主人生事迹的起伏变化,或因某一高尚的品德为君所用,为民谋福祉,得到百姓的赞扬;或因道德品行的低劣露出美好外表下卑劣的本质,为世人所不耻,这些都是世人可供借鉴的例子。假传在反映人物性格本质和物品功能特性的同时,也寄寓了作者对于高尚道德品行的追求。

王冕《梅先生传》赞扬梅先生(梅):“为人修洁洒落,秀外莹中,玉立风尘表,飘飘然真神仙中人。所居竹篱茅舍,洒如也。……先生雅于高人韵士游,徂徕十八公、山阴此君辈皆岁寒友。”^[29]通过对梅先生相貌为人,与高洁之士游历的描写,刻画了梅先生修洁洒落,道德品行高尚的人物形象。苏轼《江瑶柱传》太史公曰“里谚有云‘果蓏失地则不荣,鱼龙失水则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瑶柱,诚美士乎!方其为席上之珍,风味蔼然,虽龙肝凤髓,有不及者。一旦出其时而丧其真,众人且掩鼻而过之,士大夫有识者,亦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处不可不慎也,悲夫!”^[30]世界上每个人和每种物品都有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若为了一时之需或一时之气而离开,必然会招致祸患。士大夫亦然,一旦失其时、出其地,就会丧失其真正的自己,士大夫有志者就因当保持其品行节操的高尚,成其为真正的士大夫。《黄甘陆吉传》曰“传曰‘女无好丑,入宫见妬,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此之谓也。虽美恶之相远,嗜好之不齐,亦焉可胜道哉!”^[31]刘跂《玉友传》曰“玉友名氏弗章,独以德称,其亦有以也夫。”^[32]也都是从人品道德角度对人物展开的评价。

(三) 反映社会问题的主题

古代士人在关注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这个社会,以自己的文章反映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揭露社会的腐败,寄寓对于世态人情的讽刺,正是假传的题中之义。伴随城市政

治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例如对于“金钱”贪婪,导致社会风气的日益腐败,此现象在元之后的假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例如吴应紫《孔元方传》、胡长孺《元宝传》、贝琼《古泉先生传》、释克新《孔方传》、徐任师《孔方传》、朱骏声《孔方传》、史念祖《孔方传》等,这些假传在追溯金钱的渊源,概括金钱发展特点,总结金钱影响的同时,对人心的贪婪和世道的沦陷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在游戏文笔中寄托讽喻之意。

胡长孺《元宝传》不仅记载了元宝(钱)受到众人喜爱的一面“上自京师辅郡,遐方边鄙,岭南海表、九夷百蛮之外,穿匈连颈、形语水行之民,及山栖舟居、渔樵匹士、释子冠师,一息不得宝,皆不得所欲。”上自高官,下至各行各业的百姓,都想要得到元宝,无论遇到什么事,只要元宝至,不问事情的轻重缓急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同时也记载了元宝的缺点“其性贪甚,好与博徒大狙为钱交通暴豪,抄掠齐氏。事是非曲直,辄变乱以从其意。……宝方击穀连骑偏于天下,刑赏定乎其身,荣辱击乎其口。”^[6]从贪得无厌、胡作非为、扰乱社会秩序等方面刻画了元宝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对因金钱给社会带来的不良风气,给百姓带来的贪恋之心进行了讽刺。高明《乌宝传》也写到了乌宝(钱)“人争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则老稚婢隶无不忻悦”,“凡有谋于宝,大小轻重,多寡精粗,无不曲随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爱”这样深受欢迎的一面。另一方面,“宝轻薄柔默,外若方正,内实垢污”,“素趋势利,其富室势人每屈辄往,虽终身服役弗厌。其窳人贫氓,有倾心愿见,终不肯一往”,“宝好逸、恶劳、爱俭,素疾华侈”,^[7]生动刻画了乌宝好逸恶劳、趋炎附势、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性格特点,这些同时也是“钱”这一物品的主要特征。吴应紫《孔元方传》评价元方的为人“志大材疎,始折节力行”有可取的地方,但在元方得君王重用时,“谋不以道,剥下佐上而以为功,使盗跖复生”,使其“放弃德义,以富取贵,卒无远谋,箠至除陌,为国敛怨”^[8]的本质得到显现。贝琼《古泉先生传》记载的泉(钱)既能够救济天下之患,“凡国有大事必资之泉,而民间尤仰之”,又可以起天下之奸,即给社会百姓带来弊端,“时吏民起而为奸,法不能禁,

死者数万人,自出者百余万人”,“虽附权党势,不交廉介士,此泉之恒态。然得之则贫可以富,卑可以尊,死可以生,穷可以通。失之则智者愚,勇者怯,故泉未始求于人而人争欲致之。惟其废天下之义,败天下之法,君子深恶之”。所以,作者在“太史公曰”中总结泉之所以可以祸患世道人心的原因在于:“恃泉以为理,则上下知有利而不知其义。”^[9]天下世人只知道钱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了其致使人们贪婪腐败的一面,作者不禁反问“泉果利己乎”?对世态人情进行了讽刺。

假传,作为传记中的一种,以史传笔法将物品当做人来写,不仅继承了史传的叙事模式,记载了人物的家世出身、性格品行等主要事迹,较为公允地评价了传主即物品的功能和影响。而且还融合了小说、寓言中夸张、荒诞的写作手法,编排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以游戏的态度将历史典故、情景敷衍成篇,作为传主的主要事迹,或暗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或隐喻人物的道德品行,或表现人物的成就影响,并且以语带双关的句子和词汇展现人物的言行事迹,暗含了物品所具有的功能特性。通过诙谐幽默的笔墨,寄寓了作者对于自身仕途穷达、道德品行以及社会问题的见解和看法,展现了作者的人生社会理想。假传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 [1]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53.
- [2] 贺复征. 文章辨体汇选 [M] // 四库全书: 第 140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3.
- [3] 柳宗元.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M] // 柳宗元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267.
- [4] 孙昌武. 柳宗元评传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96.
- [5] 韩兆琦. 中国传记文学史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2: 332.
- [6] 颜瑞芳. 唐宋拟人传体寓言研究 [M] // 古典文学: 第 14 集, 台北: 学生书局, 1997: 127.
- [7] 赵润济. 韩国文学史 [M]. 张琬琰,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248.
- [8] 姚只. 广注古文辞类纂 [M]. 上海: 世界书局印行, 1935: 14.
- [9] 吴文治. 韩愈研究资料汇编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0] 陆龟蒙. 管城侯传 [M] // 全唐文: 第 801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3.
- [1] 苏轼. 江瑶柱传 [M] //全宋文: 第91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2] 苏轼. 温陶君传 [M] //全宋文: 第91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411.
- [3] 秦观. 清和先生传 [M] //全宋文: 第120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4] 张耒. 竹夫人传 [M] //全宋文: 第128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5] 杨万里. 敬侏儒传 [M] //全宋文: 第240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36.
- [6] 李纲. 武刚君传 [M] //全宋文: 第172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253.
- [7] 李纲. 方城侯传 [M] //全宋文: 第172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8] 李纲. 文城侯传 [M] //全宋文: 第172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9] 杨维桢. 竹夫人传 [M] //全元文: 第42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146-147.
- [20] 王冕. 梅先生传 [M] //全元文: 第60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 [21] 陈造. 蕲处士传 [M] //全宋文: 第256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389-390.
- [22] 杨维桢. 麴生传 [M] //全元文: 第42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 [23] 张守节. 史记正义 [M] //四库全书: 第24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82.
- [24] 胡宝华. 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26-34.
- [25] 司马迁. 史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74.
- [26] 王禹偁. 乌先生传 [M] //全宋文: 第8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116-117.
- [27] 司空图. 容成侯传 [M] //全唐文: 第810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526.
- [28] 苏轼. 黄甘陆吉传 [M] //全宋文: 第91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408.
- [29] 刘跂. 玉友传 [M] //全宋文: 第123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237.
- [30] 胡长孺. 元宝传 [M] //全元文: 第13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551.
- [31] 高明. 乌宝传 [M] //全元文: 第51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100.
- [32] 吴应紫. 孔元方传 [M] //全宋文: 第356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220.
- [33] 贝琼. 古泉先生传 [M] //全元文: 第44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484-485.

On Stylistic Features of Pseudo-biography in Ancient China

LOU Xin-xing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Pseudo-biography, or “*Jia Zhuan*” in Chinese literally, is a genre that applies the biographical techniqu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to the description of inanimate objects. In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pseudo-biographical works, covering a great range of objects and featuring different series of topics. As far as its writing techniques are concerned, pseudo-biography incorporates the features of historical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biographies, novels, and fables; it not only “plays on the history”, i. e., imitates the model of historical biographies, but also integrates such skills of novels and fables as exaggerations, allusions and puns, thereby impressing the readers with a seriocomic style of narration. Through such humorous skills, pseudo-biographical works express their authors’ understanding of, and opinions on, their own careers, moral virtues and social problems, and display the biographers’ literary philosophies and personal ideals.

Key words: pseudo-biography; play on the history; allusion; pun

(责任编辑 钟晨音)